

论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化”

白煜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生态文明的理论背后无不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生态化”实践。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生态性”的内容,但问题是“生态性”并不等于“生态化”。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化”才能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不断地完善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最终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化”的实践逻辑转向“生态化”的马克思主义自觉精神逻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生态性;生态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1-0017-04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否认自然界、人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既定的生态法则,它历来都非常重视生命界、无机界这样一个能量交换过程所遵循的普遍自然规律。自然世界的进化产生了人类及其人类社会,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最基本的物质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而相对于自然世界的人类社会,它同样具有自然化、社会化的双重生命逻辑。其内部也是一个自然的生产过程,包括物质资料生产、人口生产以及精神生产等基本内容。所以,要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放在整个生物圈中去理解,人类才不致在社会发展中丧失责任、丧失道德,陷入自然与我的逻辑悖论。生态文明理论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反思自我,批判人类片面的生产方式,在生态危机中寻求人类与自然和解的重大思想变革。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分析

生态作为一种文明进入人类的社会、文化视域,本身就象征着人类理性的巨大进步。生态与文明的结合,是社会“自然性”成长与发展的必然结果。“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指家或者我们的环境。后来逐渐演化并生成了今天的生态概念,一般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文明则是指人类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所凝聚的优良性成果。可见,生态文明就是把自发、自为的天然自然的存在、进化程度提

升到人类文化的高度,给予人类充分的关注、理解与保护,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一种整体和谐状态。根据学界的理解,生态文明大致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生态文明在社会形式上是一种制度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即“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意味着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文明程度。”^[1]二是,就社会内部结构要素的划分而言,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并列的文明形态,“四者共同构成了社会的文明系统。”^[2]三是,从文化伦理和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状态上,把生态文明归结为“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3]“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4]由此观之,生态文明着重强调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人类在遭遇环境问题、生态危机之后,所提出的一种文明、持续、理性的发展理念。目的在于重构自然与人我之间的本真关系,创建有别于工业文明的社会价值形态。作为一种过渡的人类文明,在某种程度上,生态文明的语意是宽泛的、抽象的,甚至是模糊的。但作为一种理想的文明符号,它又是充满人性化的内涵和张力。

收稿日期:2012-07-21

作者简介:白煜(1974—),男,甘肃庆阳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其一,生态文明是一种创新型的价值形态,重点是重塑社会价值体系,不断地提高人对生态世界的认识,更全面地考虑人的本质性存在方式。从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来看,其更加强调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本质就在于建构一种合理的社会价值体系。尤其是把人的本质放在突出地位,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生态文明观认为,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万物之一员,自然之一分子。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改造,必须以保证整体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为前提。^{[5]38}

其二,生态文明也是一种实践性创新,对应的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具体为一种行为规范的创新。从社会实践层面来看,生态文明更加注重自然本身的价值问题,认为环境也是生产力,追求环境、生态要素在GDP中的含量及其权重,走内涵型、生态型经济发展模式。正如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6]这就把主动性、创造性的人类社会实践与自然物质世界的实在性、价值性统一起来,避免以牺牲人类自身的生态环境来换取纯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环境作为一种利益,作为一种资源,更作为人类生命体的存在和拓展空间,尤其作为人类精神的乐园,它比任何单纯的物质享受都要丰富和实在的多。可见,人的社会实践既是物质要素的统一,又是自然要素的统一,说到底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本质统一。生态文明的实践创新既源于社会生产方式,又源于人们的具体行为规范,因此,必须深入到当下社会实践当中,通过变革社会生产方式,转换人们的行为规范,以绿色生产、绿色生活代替传统的粗放型行为模式。同时,“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型文明,应通过政府、企业、公众等的行为,运用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等多方面手段,通过确实有效的方法,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问题。”^{[5]9}显见,生态文明就是以新的社会实践方式引领时代的内涵性创新,归根结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创新。

其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制度形态,它包含着全面地制度创新,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从生态文明产生的社会基础看,它是对传统文明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性继承和超越,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环境主义者认为,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对经济运行方式、政治体制、技术发展和价值观念所作的任何修补和完善,都只能暂时缓解人类的生存压力,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工

业文明的生态危机。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从总体上彻底解决威胁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5]3}另外,生态文明还是一种文化创新,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和信念的文化取代那种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的需求为中心、以自然界、自然环境为征服对象的文化,是一种基于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为主体构成的文化体系。”^{[5]84}它有别于工业文化的核心价值——人与自然的分离。它所指向的是一种系统的文化生存方式,即要在工业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生态转向,要在人的生存方式上融进生态思维、生态理念,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当中确立一种生态的价值追求。

二、生态文明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化”的实践进程

马克思主义既是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又是生态文明实践的重要价值基础。以生态文明的时代精神、实践要求丰富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性创新,这本身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生态性”要素的增长和“生态化”过程的展开。

1. 马克思主义“生态化”是合生态文明内涵的“生态化”

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生态思想不仅印证了生态文明理论,而且也推动着生态文明本身的建设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生态文明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生态问题更加具体化、系统化,在本身“生态性”的基础上,以新的实践方式推进过程的“生态化”。随着这一过程的延深、拓展和变迁,又内生出新的“生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化”的实践逻辑。“生态化”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实践方式,“生态文明要求从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性出发,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发展生产力,从而建立生态化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生态经济新秩序。”^[7]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化”的实质,就是要深入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以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模式使社会生成更多的“生态性”内容,实现社会综合指标的绿色增长,最终以“生态化”的社会长程模式引领和主导社会内涵“生态性”的自觉建构。其中生产力的“生态化”具有根本性、标志性,生态文明本质上就是要实现生产力的“生态化”,使生产力各要素及其要素之间达到“生态性”的配置,减少社会生产力对自然生产力(环境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的非理性依赖和破坏,从根本上扭转传统工业文明的非生态生产方式。“生态文明要求人们积极改善环境与发展之间的不

协调关系,使生产方式向着‘生态化’的新形式发展,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环境与发展的统一,实现社会、自然与人类的永续发展。”^[8]这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生态化”,本质是生产力“生态化”推动的生产方式“生态化”。这一认识和主张无疑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态观,使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阐述更加科学和全面。

“现在‘自然问题成为人们日常思考的主题,是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人类都共同关注的唯一问题。生态精神在这一意义上是跨文化的,它在改造着我们的现代性文化;世界的重心正在从社会转向自然’。”^[9]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的渴望和回归,是推动生态文明社会构建的内在动力。然而这种回归并非原初意义上的回复,在根本意义上是人类生存文化的生态转向,是人从一种物质形态的片面享受转向侧重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精神环境的志趣陶冶。世界的复杂化、多样化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并不是一种固化的模式。新的社会内涵、社会特质、社会实践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内部作用机制和生成机制本身是“生态性”的,以这种“生态性”为主导的“生态化”演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摆脱时代的白窠,用新的时代语境、价值内涵重构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

2. 马克思主义“生态化”与当下中国社会

从历史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生态化”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化”具有内在的渊源关系,但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它又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化”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仅此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生态化”才刚刚开始。

在生态文明的时代语境下,由生产方式变革所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化”实质上是一场生态革命。“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实践。”^[8]因革命而发生的社会形态的巨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从内心深处影响和构造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巨变就是一种文明转型,科技是其中的促因,关键民众的价值观和意识则是决定因素。”^[10]这一革命也离不开国际的合作,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所承担的生态压力、生态责任是毋庸置疑的。节约型社会、循环经济、低碳社会等概念的提出,无不反映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从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逐步延伸到社会生活领域,从一种注重量的积累也逐步过渡到社会系统内部质

的提高。生态文明的内涵日益丰富和多元化,它的指标体系也更加科学和趋于合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生态化”的过程,还包含着与以往非生态的思维方式、经济模式、政治体制、文化系统等划清界线,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现时的环境危机已如此之严重,以致我认为我们的文明本身必须被视为患了某种机能失调症。”^[11]环境问题的愈演愈烈,逼促着中国必须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化”与生态治理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具体的实践路线和实践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化”的进程。有人说中国目前正处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阶段”,“中国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即建立在有机联系概念基础之上的推崇多元和谐的整合性思维方式,它是传统、现代、后现代和中国现实的有机结合,是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的超越,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化。^[12]从这个层面上讲,马克思主义“生态化”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要放在人类社会的长程发展模式中去考察,在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元并存的社会结构当中,要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化”与这些时代命题结合起来,破解中国当代及未来社会的发展问题。同时,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尤其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群众的观点,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马克思主义“生态化”的主体合力和精神合力。

三、“生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化”的必然结果

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化”向“生态化”的马克思主义过渡,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其中质量互变规律是决定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一定的量变引起事物的质变,一定的质变又会引起新的量变,质量互变中都有部分的量变或质变。马克思主义“生态化”正是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性”内容的基础上,不断地形成一种量的积累。随着这种量突破现有的“生态性”内涵,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化”的道路上就有了新的质的规定性,处于事物新阶段的这种质的规定性比先前的质性更高级、更文明,更具自觉性和建构性。这种优化的质性结构,通过主体日益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逐渐内化为事物的一种优秀品质和素养,从而自觉推动事物向“生态化”的方向继续前进,亦即“生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步骤来完成。

第一,从生产力的“生态化”过渡到“生态化”的生产力阶段。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初期阶段,社会主要以生产力的“生态化”为行动路线,主要依托科技手段、经济行为、政治号召和文化传播等基本形式自上而下的推进生产力的“生态化”。这一“生态化”的动力源自政府的权威,广大群众参与程度相对较低,人们对“生态化”的认识还比较粗浅和片面,直觉化、兴趣化和边缘化的非理性行为明显。在思想领域,自发性主体意识占据主要地位,“生态化”的只言片语只是人们闲情逸致的心绪勃发,还远未形成一种制度化、自觉化的生态建设运动。而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以生产力“生态化”为引领的社会化进程,积聚了厚重的物质能量和精神能量,使生产力“生态化”成为一种常态,成为生态文明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

随着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日益成熟,生产力“生态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如果引进耗散结构理论的相关知识,不难发现,这一常态结构之所以保持恒久是源于与系统外部的物质与能量的持续交换。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常态,耗散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开放系统、涨落、突变的结构形式。由于生产力在“生态化”过程当中,“生态性”(可称之为系统内正熵)要素越来越多,越来越集中,而系统又要保持这种“生态性”的内在平衡,结果系统的正熵过多,又无法与系统外负熵(新的生态要素)及时交换,从而引发系统内部的紊乱和有序状态。使“生态化”的过程出现涨落或者突变,进而远离平衡态。生产力“生态化”的常态被打破,要恢复这一平衡态,必须创造条件或者调整系统结构,让负熵(新的生态要素)及时打入系统内部,造就一个新的平衡态系统,亦即“生态化”的生产力阶段。这一“生态化”路向的转变,将使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使生态文明形态从初级阶段跃升到高级阶段。

第二,从生产关系的“生态化”过渡到“生态化”的生产关系阶段。生产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社会初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主要依赖于生产力的“生态化”程度,以政府为主导的生产力解放模式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建构的被动性、依赖性和单一性。即非生态的因素仍然占据主要地位。这就要求必须大力推进生产关系的“生态化”,使生产关系系统内部植入越来越多的“生态性”要素,使“生态化”也成为一种常态。进而如同耗散理论的要求,最终从生产关系的“生态化”过渡到“生态化”的生产关系阶段,在总体上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自觉性、理性建构。

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化”过渡到“生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必然趋势,它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生态化”演变中,逐渐生成的一种文明“生态”模式,是生态文明社会应有的内涵。随着人们价值观领域的变革,“生态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必然以自觉地“生态化”社会实践为基础,使人们的生产模式、生活模式转变为一种“生态化”的自觉行动。在此语境下,绿色价值观成为当下人们的一种自觉体认。从价值观到行为,不再是一种生态责任,而是一种生态权利。人们以生态权利为出发点,自觉构建着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因而,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化”到“生态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从生态文明的实践逻辑向自觉、开放、多元的精神逻辑的转换。“生态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内化为人们的自觉信仰,人们不仅享受着生态世界的物质利益,而且在创造的生态文化中享受着高雅的生态情趣的愉悦,尤其受精神生产的“生态性”浸润,人的自我本质、自我价值的实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参考文献:

- [1] 卓越. 加强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建设的思考[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3): 106-111.
- [2] 张云飞. 试论生态文明在文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J]. 教学与研究, 2006(5): 25-30.
- [3] 潘岳. 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N]. 学习时报, 2006-09-27(3).
- [4] 俞可平. 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4): 4-5.
- [5] 姬振海. 生态文明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6]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于光远,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295.
- [7] 高中华. 环境问题抉择论: 生态文明时代的理性思考[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65.
- [8] 徐春. 生态文明蕴涵的价值融合[N]. 光明日报, 2004-02-04(2)
- [9]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还自然之魅: 对生态运动的思考[M]. 庄晨燕, 邱寅晨,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7.
- [10] 欧文·拉兹洛. 巨变[M]. 杜默,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2: 18.
- [11] 阿尔·戈尔. 濒临失衡的地球: 生态与人类精神[M]. 陈嘉映,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198.
- [12] 苏志加. 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 第三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论坛综述[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1): 31-33.